

台灣國家認同研究的現況與展望

陳牧民*

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壹、國家認同與統獨問題

在台灣，「統獨問題」與「國家認同」問題往往是激發不同黨派進行政治動員的主要動力。1980年代，族群與省籍之間的矛盾逐漸形成黨外政治運動發展的主要動力。隨著反對運動的逐漸發展、以及解嚴與民主化的政治效應，使得族群之間的衝突逐漸演化為對國家認同問題。統一與獨立分別代表台灣社會台灣未來發展定位的兩種不同看法。在統獨光譜上，獨的力量之所以能不斷成長，除了北京政府在國際社會上的打壓之外，台灣社會在其獨特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凝聚出的自我認同意識似乎更為關鍵。和世界上許多空有主權外表，但政府毫無治理能力的國家相比，台灣這個擁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經濟實力排行世界十七、並享有健全民主制度的社會當然有權利宣稱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縱然在現實條件下，台灣成為真正獨立國家的理想仍未實現，但台灣國族主義者已逐漸勾勒出一個明確但充滿吸引力的目標：與其去擁抱一個強大但不自由的祖國，不如傾全力把台灣建設成一個小而美、充滿自由開放氣氛的樂土。這樣的思維多少承襲了過去反共教育時期將台灣與大陸劃分為民主與非民主的簡單邏輯，但眼前的大陸，除了在經濟上所散發的極大誘因之外，台灣人似乎看不到任何非統一不可的理由。相對於台灣國族主義所描繪出的「東方瑞士」前景，統一的目標似乎更顯得不切實際。

另一方面，從去年連宋訪問之後所帶動的新一波大陸熱，顯示有相當比例的選民認為台灣在追求制憲正名、悲壯地抗拒中共武嚇之外，兩岸關係其實可以有另一種選擇。這個趨勢背後最大的支持力量是數十萬名早已在大陸發展的台商，以及看好大陸經濟發展趨勢的中間選民。對每年四分之一以上出口產品仰賴大陸市場的台灣而言，擁抱中國市場已經不是選擇題，而是維持經濟命脈的唯一道路。因此國親等反對黨巧妙地避開兩岸政治制度差異與一中原則詮釋等敏感問題，將兩岸和解定位在為「鎖國式台獨運動」尋求解套之道，當然獲得許多選民的擁戴。

* mumin@cc.ncue.edu.tw

撰寫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統獨問題為核心，勾勒出過去數年來台灣國家認同研究發展的主要脈絡。與其他研究題目相比，國家認同與統獨現象的研究是少數橫跨政治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不同領域的主題，而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與兩岸關係的發展也為國家認同研究提供源源不斷的研究素材。以下分析將著重在介紹近年來台灣國家認同研究的各種理論流派、各類實證研究的資料、以及國際學界對台灣國家認同問題探索的程度。

貳、國家認同的定義與理論發展

即使對「國家認同」有共同的研究興趣，不同學者對此概念仍有不同的定義與主張。蕭高彥認為，「國家認同」可界定為「公民對其所屬政治共同體主動的認同 (willing identification)，由之產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願意積極地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體有危難時願意犧牲自我」。蕭認為，共同體內成員政治意識的表達、理性與言說的運用過程，以及具有情感面向的凝聚力構成國家認同的三種主要特 (蕭高彥，1997：4)

江宜樺則認為，「認同」一詞意為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身在時間及空間上的存在」但此一過程不僅包括個體自我認識過程的主觀瞭解，也包含他人對此一個體自我存在的認識；依照此一脈絡來看，「國家認同」可定義為個人「對國家的確認與歸屬」。但由於「國家」概念的多面向特性，使得「國家認同」至少涵蓋了血緣與宗族關係的族群面向、鄉土歷史感情的文化面向、與主權政府下公民權利義務關係的政治面向等 (江宜樺，1997：96-99)。

施正鋒由「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兩概念的差異出發，將國家認同視為國家「經不斷互動、協商、學習、定義及建構而成的自我定位」。對內而言，國家認同會受到族群、政黨及利益團體的互動影響，也會受到社會文化及政治制度的限制；對外則受到與他國互動的影響。(施正鋒，2004：1)

最後，張茂桂則由身份認同政治的角度切入，認為「身份」本身就是「社會關係位置的建構」的一種形式。在「身份」轉化為「認同」的過程中，情同感 (solidarity) 與社群 (community) 因素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因此「認同」必須是對立性的社會關係形成之後，行動者透過建立社區、共識、行動、情同感等方式形塑出對「我們自己」的認知共識而成。(張茂桂，3-6)

無論是情感歸屬、身份定位、還是社會關係的建構，國家認同研究的出現與發展都與當代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在比較政治領域，身份與認同起源於冷戰結束後學者對民族主義與族群政治的重新檢視。目前幾乎已經沒有學者主張民族的起源是共同的血緣關係。大部分學者認為民是因文化、語

言、宗教、地理鄰近等因素而結合，其中又以 Benedict Anderson 的說法最為著名。Anderson 認為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民族的出現是當歷史上三個古老力量喪失對人類心靈的控制之後才得以出現：手抄本控制對真理的權威解釋權、君王的至高無限、以及將人類視為宇宙力量的中心。在這三個力量崩潰之後，人類得以藉著印刷術的普及快速傳播資訊，進而重新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而重塑身份認同 (Anderson, 1991)。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學者一直到 1980 年代才認真思考「身份認同」的概念。這樣的發展源於部分學者主張人類所理解的國際政治的現象其實是歷史發展過程中某些具有主導地位的規範(norms)影響人類思想的結果，而行爲者的利益並不能單純以效益極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的理性原則(rationality)來解釋，必須追溯行爲者在環境影響下所建構出的特定身份(identity)。其中最著名的是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vism) 特別是以美國學者 Alexander Wendt 為代表，專注在批判現實主義只重視有形物質力量 (material forces) 卻忽略理念 (ideational factors) 的影響。他們認為，國際政治中主要行爲者之間的關係 (友好或是敵對) 取決於這些行爲者在環境影響下所建構出的特定身份 (identity)。建構主義者不認為身份是客觀的存在 (objective existence)，而是行爲者與其外在環境在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互動過程中建構出來的結果。袁鶴齡認為：建構主義理論中國家認同是團體透過類別化過程區分我群與他群的差異，再經過彼此互動過程而強化其力量。對應參照團體的存在是正面參照團體國家認同存在的重要因素，因此國家認同是主體間關係 (relational) 的產物 (袁鶴齡，2000：148)。

當台灣學者以國家認同作為研究題目時所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台灣社會常將「統獨問題」、「國家認同」、甚至「族群認同」等概念混用。其實這三個概念確有不同。統獨問題的核心是對台灣未來前途的政治選擇，而國家認同與族群問題則是人民感情價值的表達。因此部分學者主張「統獨問題」與「國家認同」二者是可以嚴格區分的。如吳乃德即認為統獨牽涉到「國家的選擇」，而「國家認同」則是個人對國家的「感情依附與歸屬」(吳乃德，1992：40-41)。江宜樺認為統獨議題本身具有二元對立、非黑及白的特性，而國家認同問題比較沒有這種效果。因此一個台灣人可以因民族情感等因素認同台灣或中國，也可以因羨慕美國或日本的政治制度或文化而認同美國或日本 (江宜樺，1998：166)。族群認同的概念或基於血緣 (福佬人或客家人)、或基於社會關係 (例如眷村外省人)，但表述方式更為鬆散，甚至可以容許出現重疊的情況，例如在民調中出現的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方式。

這些概念之所被混淆，與台灣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有密切關係。自台灣民主化

以來，「國家認同」一直以「支持獨立」（認同台灣）與「支持統一」（認同中國）的二元對立方式來呈現，因此本文並不打算將這兩個問題做出明確切割。以國家最終命運（統與獨）作為國家認同的標準表述方式，或許是台灣國家認同研究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

參、台灣國家認同的研究

江宜樺在 1998 年發表的「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一文中，嘗試由「國家認同方式」的角度切入，將台灣社會現存的各種認同理論觀點分為三大類：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其中民族主義的立場是最為常見的思維。這類理論大體上主張「國家必須以民族為基礎，此一民族或者出自單一種族、或者以某一族群為核心，再結合其他次要族群，以形成一多少具有同質性或有同化基礎的社會實體。但由於學者對構成民族的因素並沒有一致的共識，所以無論是「台灣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主義」，都有從血緣、文化、甚至共同命運等不同角度來論述其國家認同的主張（江宜樺，1988：168）。江認為：將民族主義做為國家認同的基礎，「引起的問題比它所能發揮的功能還多」。主要是因為在台灣當前社會，為求自保所需的「我群」觀念已經十分成熟。這樣的「我群」意識並不需要民族主義認可，但以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為主體的論述反而可能摧毀台灣一致對外時所必需的我群意識。（江宜樺，1988：186）

自由主義國家認同的觀點，是將國家本身的憲政制度與人權保障視為認同國家的關鍵。依照江宜樺的分析，可被歸類在自由主義陣營底下的觀點包括陳其南的「公民國家主義」、蔡英文「自由主義式的認同政治」、以及蕭高彥的「共同體理念」。這些學者與前述民族主義者不同的地方，是將「憲政制度」取代「民族」成為國家正當性存在的唯一基礎。自由主義者的最大盲點，是在論述過程中刻意壓低族群及文化因素的作用，而忽略族群文化根本就是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因素，而自由主義所蘊含的普遍主義傾向也使其難以成為特定國家的認同基礎（江宜樺，1998：199）。

激（基）進主義的觀點，是試圖推翻以「國家」作為建構國家認同主體性的合法性。這類主張大多以後現代主義、後結構、後殖民主義理論為基礎，力圖解除民族主義思維的國家圖騰，建立國際性的弱勢團體反霸聯盟。但由於這類主張的影響力多半只存在於激進的社運份子與知識分子等邊緣團體之間，因此影響力極其有限。

自 1998 年以來，台灣的國家認同研究已經遠遠超出江宜樺所提出的三大類型，況且江本人也認為並非所有的國家認同的主張都能被歸納在這三大類型之

下。但江的綜合性分析已為後來研究國家認同的學者提供了一個思考起點，也有其他學者以江宜樺的研究作為國家認同研究的理論基礎（林烜好，2004）。吾人可將這三種論述方式視為國家認同研究的原型。如果純就研究的方式來看，本人認為當前台灣國家認同的研究可以在這三個原型之外，擴充為以下幾個脈絡。

第一個脈絡，是嘗試由歷史角度來論述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這類學者多半由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來分析台灣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的出現與發展。部分歷史學者嘗試由歷史上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來論證「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事實，並以台灣原住民與漢民族並無血緣關係的方式加以佐證（許極燉，1996：6）。少數歷史與社會學家以日治時代台灣人民學習成為日本人的過程作為研究主題（荊子馨，2006）。但由於台灣為社會以漢民族為主體，且語言文化均深受漢民族影響，嘗試以歷史或血緣將台灣與大陸切割的做法甚難成為台灣國族認同的主流意見，取而代之的是台灣經過四百年獨特歷史發展而形成獨特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因此多數歷史論學者都將台灣國族主義與國族意識的出現與發展作為分析的對象。其中陳翠蓮認為台灣在 1920 年代所出現的政治社會運動應被視為台灣民族主義出現的起點。雖然學者們對於日治時期台灣自治自動究竟是以台灣還是中國作為民族認同對象有不同見解，但至少當時台灣人民再向日本統治當局爭取政治權利的過程中發展出初步的「共同體」意識卻是事實。而日治時期台灣人援引母國中國為認同對象的目的是為了對抗殖民主日本，基本上只是策略運用，與台灣共產黨提出台灣獨立論並無不同。（陳翠蓮，2002）

當然更多持歷史論的學者如李筱峰等是將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視為台灣民族主義的開端。他們強調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人雖然有漢民族意識，但那並非現代式的國家觀念。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徹底祖國夢碎，進而發展出融合反殖民精神、海島文明、與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台灣民族主義。李筱峰即指出：台灣獨立的國家認同一直到二二八事件之後才出現，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兩條軸線，包括台北的政治交涉路線與南部的武裝鬥爭路線，都未提出「台灣必須獨立」的主張，而是以高度自治、反貪污為訴求，尚未提升到建立台灣國的層次。因此台灣國族主義的開始，應該是 1950 年後在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及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台灣本土性政治反對運動出現後才正式展開（李筱峰，996）。

許多以歷史發展來分析台灣國族意識的研究不具有純粹學術的目的，因而出現一些極富想像力的論述。徐宗懋曾經嘗試將台灣族群中的投機性格與現實主義歸咎為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遭強權統治所體會出來的處世哲學。他更進一步指出，台灣社會的主要族群，無論是本省人與外省人，皆是中國歷史上因政治動盪而被迫遷移到邊陲的族群。這種歷史經驗演化為偏安一隅但仍然恐懼遭中國併吞

的政治情結，以及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角色的悲情文化（徐宗懋，1993）。許信良則將台灣人描述為在二十一世紀具有優越活動經商能力的「新興民族」。他主張台灣人在對外貿易時所擁有的「共同利益」，是將台灣人凝聚在一起關鍵力量。因此在面對廣大的中國市場時，台灣人應該有自信將過去經營台灣的經驗轉移到大陸，經略中國、進而奔向世界（許信良，1995）。

另一條國家認同的研究脈絡是由政治哲學出發。這些學者的主張多半與上述自由主義的學者類似，傾向以憲政體制及公民社會來建構國家認同。江宜樺認為：「台灣國家認同如能以自由主義式的思考為基底，再加些務實的修正與考量，或許是理論上能達成共同可接受方案的做法」。江所提出的「務實考量」有以下三者：

第一，現有政治共同體的社會基礎必須尊重。這些基礎，特別是「我群」意識的建構，是讓台灣社會出現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第二，國家如在危急存亡之秋可訴諸民族主義式的動員。當台灣遭到外來武力威脅，而有被併吞消滅之虞時，民族主義可代替民主憲政成為國家救亡圖存的理由。

第三，自由主義原則下對台灣未走向的主流意見必須被尊重，即使目前台灣社會以主張「不統不獨、維持現狀」者為多，也不能指責其為認同錯亂。（江宜樺，1998：215-219）

江也承認，以自由主義作為國家認同基礎存在相當的問題，特別是其壓低族群文化等因素、排斥民族與族群概念、以及自由憲政體制所隱含的強制與暴力都是自由主義的弱點。但「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論述是過去四十幾年來唯一比較持久、比較具有社會批判意義的資產。...是指引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主要理念系統」。（江宜樺，1997：118）

江宜樺的修正式「理想主義」論述並未針對台灣在民主發展過程中「建立新國族認同」的主張逐漸被本土化國民黨吸納的現象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但此一問題卻成為另一位政治思想學者論述的起點。蕭高彥認為，從政治哲學角度來看國家認同有兩種主要觀點：文化民族主義與憲政愛國主義，前者代表「文化社群傳統所激發的情感凝聚力」，而後者則重視憲政結構所提供理性反思的現代化意識」。蕭認為台灣在解嚴之前，反對運動通過本土化與民主化的緊密結合，創造出強大的動員力量，但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李登輝現象」迫使台灣社會捨棄情感凝聚與理性反思二者的結合力量，轉而以支持民粹威權主義做為推動政治改革的動力（蕭高彥，1997：23）。當然多數政治思想學者仍然將民主憲政作為現代政治社會穩定發展的關鍵因素。不僅是因為民主憲政所蘊含的基本價值如平等、自由等為所有公民所承認及遵守，也是因為民主憲政保障人民對制度批判修

正的最後權力（蔡英文，1997：79）。當然政治理論中的國家認同觀點與台灣實際政治發展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也使得嘗試以此一角度分析國家認同的學者只存在特定的學術社群之中。

實證研究是目前研究台灣國家認同的第三條主要脈絡。這些政治與社會學者以定期對民眾進行民意調查的方式比較台灣民眾對國家認同態度的變化。早期的研究模型通常比較簡單，例如徐火炎的在 1991 年到 1993 年之間所做的研究中，將題目設定在選民對「台灣獨立」與「中國統一」兩種對立態度的反應，並將結果歸類為台灣認同、現實主義（能同時接受台獨或統一）、保守主義（維持現狀）、與中國認同四大類。如果純就民調結果來看，可發現中國認同者數目逐漸降低、而台灣認同者及現實主義的數字則有明顯增高趨勢（徐火炎，1996）。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也是部分實證研究學者關注的議題。吳乃德的研究發現：雖然在母語使用上台灣漢人可分為閩南、客家與外省等三大族群，但在族群政治上只有本省籍外省兩大族群。原因在於族群政治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歷史經驗具有重要基礎，而閩南語客家族群在政治歷史上的共同經驗，使其認同趨於一致，成為相對於外省族群的本省人。吳乃德進一步指出：現階段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社會隔離與排斥已經逐漸降低，現存的社會排斥感「似乎只是上一代政治階段的殘餘」。但在政治上，兩大族群之間的衝突仍然存在。本省人普遍認為「外省人比較不認同台灣」，只是這項源自政治認同的衝突並未擴散到社會生活領域，政治上的不信任也未妨礙族群之間的社會交往。「社會歸社會、政治歸政治」似乎是當前台灣族群關係的主要特質（吳乃德，2002：77、85）。

隨著民意調查的範圍的擴大及技術的改進，近年的研究更多是觀察台灣人民國家認同傾向對政治議題的態度。徐火炎的新研究便以兩筆全國性面訪資料來分析公元兩千年總統大選時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的選民基礎。分析結果發現：這三黨的選民在省籍、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統獨議題、台灣前途決定權認知、台灣心與中國情、以及李登輝情結等七個變相上皆有顯著的統計上差異。徐火炎認為：這些分歧的焦點，可進一步追溯到台灣社會在歷史演變過程中所形成的兩種「集體潛意識」：台灣結與中國結。前者指涉的是選民「對台灣本土或台灣為主體的一種認同感情」；而後者則為「選民對中國大陸具有的休戚與共的認同感情」。（徐火炎，2002：115）徐認為：由於台灣的選舉受易認同感情牽引，使得各政黨在選舉時只能靠訴諸「台灣結」與「中國結」的方式擴大其民意基礎（徐火炎，2002：125）

由實證研究的結果來看，目前台灣國家認同研究的趨勢是將台灣認同作為影響其他公共政策與政治走向的一個主要變相。因此研究的方式不再是純粹探究國

家認同的起源與不同族群間國家認同的差異，而是分析「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這兩種主流價值對實際政策的影響。認同與政策走向可被視為當前台灣國家認同研究的第四條脈絡。

其中一個頗為典型的研究是吳玉山對「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勢力的消長如何影響兩岸關係的研究。吳玉山指出：族群認同對國家認同的具體政策主張、特別是兩岸政策的影響其實是有限的。「中國人與台灣人之間認同的差距大於在統獨態度上的差距。雖然認同台灣意識的民眾數量逐漸增加，但是在兩岸關係上，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仍然佔絕大多數。也就是說：族群認同上的台灣化趨勢並沒有轉化為對台灣獨立的政治要求。（吳玉山，2001：84）吳玉山進一步分析此一族群意識與政策不一致的原因，發現中共的態度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中共對台灣威嚇策略，一方面增強了台灣人的主體性意識，使台灣人民認同中國的比例下降，另一方面也制約了台灣人民對獨立運動的支持（吳玉山，2001：87-88）。

類似的作法，如將「國家認同」視為影響公民政治態度主要因素的研究方式在政治學界屢見不鮮。以公民投票為例，公民投票與台灣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可有兩種觀察方向：其一是將公民投票作為台灣認同結果的公共展示，當然這必須看公投議題是否與國家認同有直接關係；另一種是將公民投票實踐的過程是否有可能改變人民對公投的看法，這只有在公投與憲法或主權有關的議題時才有可能發生（賴怡忠，2005：98）。徐永明、蔡佳泓、與黃琇庭的研究便檢視了台灣認同對參與和 2004 年總統大選同時舉辦的公民投票的影響。研究中發現認同自己為台灣人的選民有 73.4%參加公投、而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 73.5%決定不參加公投；至於有雙重認同傾向的民眾，也有三分之一傾向參加。有趣的是，雖然這些有雙重承認傾向的民眾參與公投的意願偏低，卻十分關心公民投票，有八承受訪者表示未來會參與與公共政策及法律有關的公民投票（徐永明、蔡佳泓、黃琇庭，2005：64-65）。

肆、延續與創新

以上分析將過去十多年來台灣國家認同的主要研究及派別做出簡單介紹。當前台灣國家認同的研究，在某些議題上已呈現出延續與集中的現象。這對鞏固研究成果、深化相關議題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

首先，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國家認同」與「政治民主化」之間的關聯性感到興趣，進而使得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國家認同的變化與發展成為學者持續關注的課題。許多政治理論學者都同意國家認同在一國政治體制由威權轉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可扮演比較正面的角色。人民藉著對具象國家圖騰的效忠而增強其對國家憲

政體制的向心力，進而鞏固民主基礎。這對一個由威權轉變為民主的社會而言十分關鍵。以南韓為例，過去幾十年來這個國家一直存在著「湖南」地區（全羅道）與「嶺南」地區（慶尙道）之間的地域衝突。這樣的地域主義更因威權時代政治經濟資源大部分掌握在嶺南地區出身的人士而更難化解。但在南韓逐漸邁向民主化之後，兩地的選民均能接受以定期選舉方式選出的國家領導人。1997 當選大總統的金大中出身湖南地區的光州市，而 2002 年當選大總統的盧武鉉則為出生於慶尙道的光州人。可見民主機制在選民由地域認同轉向國家認同的過程扮演一定的作用。當然，不同族群對國家認同對象的不一致，也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南斯拉夫在冷戰結束後，以民主方式選出的塞爾維亞裔的國家領導人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為鞏固其統治權，推行仇視其他族裔的政策，使南斯拉夫陷入長達近十年的內戰。可見民主有時不一定能維繫原本脆弱的國家認同。

另一個學者集中研究的議題是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之間的聯繫。過去針對兩岸關係的研究大多專注在美國—中國—台灣之間的戰略互動，特別是美中之間的軍事力量的消長或台灣與大陸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對兩岸關係走向的影響，對國內因素甚少關注。論者大多將國際體系下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作為研究的參考起點，其結論多是將台灣視為崛起的中國與美國兩大強權之間爭霸的籌碼。台灣的最後命運取決於中美兩大強權在東亞區域勢力的攻防結果（Wu, 2000; Campbell and Mitchell, 2001; Lieberthal, 2005）。但近年來隨著國內學者對台灣國家認同趨勢的關注，更多的研究將台灣的本土認同的提升視為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Chu, 2004; Wang and Liu, 2004）。這類研究大多主張台灣社會逐漸增強的台灣意識（Taiwanese identity）與獨立傾向對台灣選民在兩岸關係未來發展趨勢上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事實上北京政府也針對台灣越來越強的獨立意識而陸續做出新的政策調整：如 2005 年 3 月由其全國人大制訂「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訂出將以「非和平方式」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後手段」；以及今年透過反對黨領導人登陸及「國共經貿論壇」，釋出包括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等多項實質利多。然而也越來越多學者指出台灣人民國家認同傾向與其對兩岸政策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根據今年三月海基會所做的民調：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已經高達 60.2%，但支持獨立者只有 33.1%。這顯示有相當比例的人並未將其國家認同傾向轉化為對台灣終極走向的支持。這或許是學者必須繼續深究的現象。

最後，無論從實證研究或是歷史觀察的角度來看，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台灣在歷經民主化與本土化之後，一個新興的台灣國族認同已經儼然形成。當然台灣是否是一個獨立國族的爭論從未停歇，但台灣特殊的歷史發展過程以及特殊國際政治環境所造成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取代傳統「閩南

／客家」或「本省／外省」等傳統族群認同的標籤。即使以漢人為主體的台灣社會在一百年前就已形成，但這種「台灣人意識」從出現、成型到廣為社會接受卻是相當晚近的事。Anderson 的「想象共同體」論述為台灣國族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近年來西方學者如 Shelley Rigger、Melissa J Brown 等學者更嘗試對台灣國族的出現進行系統性的描述（Rigger, 1999/2000, Brown, 2006）。這些研究對瞭解台灣社會的發展過程確有一定的助益。

未來台灣國家認同的發展軌跡大概是：一方面台灣自身的國族認同繼續獲得強化，隨著台灣新一代住民對「中國」的歷史記憶逐漸淡化，來越多的人將會認定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任何能強化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的論述或圖騰，從公民投票到紀念二二八事件，都會繼續存在甚至發揮一定的功能。但另一方面統獨問題會逐漸轉化為以「中國威脅」及「中國市場」的論述方式而存在。其中「中國威脅」論述的基礎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不確定與不信任，因而認定台灣唯有取得完全政治獨立的地位才能獲得安全的保障。「中國市場」論則以經濟全球化為出發點，斷言如果台灣繼續自外於大陸市場之外，不僅資源都會被擋在台灣之外，也會讓台灣更快速的邊緣化。這個問題並未因台灣國族認同的建立而自然解決。看來台灣與中國之間糾纏不清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以及台灣在國際上的最終定位，未來將仍然是牽動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主要力量。

參考文獻

- 江宜樺。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5期，頁83-121。
- 江宜樺。1998。〈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9期，頁163-229。
-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與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4期，頁75-118。
- 吳玉山。2001。〈兩岸關係中的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中國事務》4期，頁71-89。
- 李筱峰。1996。〈一百年來臺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收錄於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臺灣近百年史論文集》頁275-302。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 林姮妤。2004。〈社群主義的國家認同觀：台灣族群意識形成的觀察〉《立法院院聞》32卷9期，頁50-62。
- 施正鋒。2004。〈台灣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台灣民主季刊》1卷1期，頁185-92。
- 徐火炎。2002。〈台灣政黨版圖的重劃：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比較〉《東吳政治學報》14期，頁83-134。
- 徐火炎。1996。〈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間的實證研究結果〉《台灣政治學刊》1期，頁85-127。
- 徐永明、蔡佳泓、黃琇庭。2005。〈公民投票——台灣國家認同的新動力〉《台灣民主季刊》2卷1期，頁51-74。
- 徐宗懋。1993。《台灣人論》。台北：時報文化。
- 荊子馨。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
- 袁鶴齡。2000。〈國家認同外部因素之初探：美國因素、中國因素與台灣的國家認同〉《理論與政策》14卷2期，頁141-63。
- 張茂桂。1996。〈台灣歷史上的族群關係：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台灣史蹟研習會講義彙編》。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編。
- 許信良。1995。《新興民族》。台北：遠流出版社。
- 許極燉。1996。《台灣近代發展史》。台北：前衛出版社
- 陳翠蓮。2002。〈台灣國家認同的研究近況〉《國史館館刊》復刊33期，頁10-17。
- 蔡英文。1997。〈認同與政治：一種理論性之反省〉《政治科學論叢》8期，頁51-83。
- 蕭高彥。1997。〈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6期，頁1-27。
- 賴怡忠。2005。〈從公民投票看台灣主體定位〉《國家政策季刊》4卷3期，頁89-108。
-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
- Brown, Melissa J. 2006.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mpbell, Kurt, and Mitchell, Derek. 2001.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4, pp. 14-25.

- Chu, Yun-han. 2004.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Prosp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4, No. 4, pp. 484-512.
- Lieberthal, Kenneth. 2005. "Preventing a War over Taiwan."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2, pp. 53-63.
- Rigger, Shelley. 1999/2000.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ritique." *Pacific Affairs*, Vol. 72, No.4, pp. 537-52.
- Wang, T. Y., and Liu, I-Chou. 2004. Contending Identities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4, No. 4, pp. 568-90.
- Wu, Yu-shan. 2000. "Theorizing o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Nine Contending Approach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9, No. 25, pp. 407-28.